



编
山
代
考
古
学
部

主编

鲍杰

副主编

包鹤年

孙善根

宁波出版社

96
F729.5
3

2

XAJ55/16

论近代宁波帮

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宁波同乡联谊会)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编

宁波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

宁波出版社

C 258552

责任编辑：沈建国
装帧设计：梅则伟

论近代宁波帮 鲍 杰 包鹤年 孙善根编

宁波出版社出版发行 宁波甬江印刷厂二分厂印刷
(宁波市县前街 61 号) (宁波市庄桥)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20 万 印数: 1 - 4000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02 - 086 - 1/K · 3 定价: 9.50 元

顾 问 项秉炎 张永祥
 徐季子 金 涛
主 编 鲍 杰
副主编 包鹤年 孙善根

序

自 1984 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号召以来，“宁波帮”问题开始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注目，也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对近代以来的“宁波帮”，国内外学者通过初步的探索研究，先后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与宁波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合作，决定把这些成果汇编成册，以期反映近代“宁波帮”研究的现状和学术水平，也可窥见近代“宁波帮”历史发展的轨迹。这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论近代宁波帮》一书问世之际，主编鲍杰同志约我为此书作序，我欣然同意。

宁波是一个古老的商埠，唐宋以来一直是我过重要的对外交通贸易港口城市。城乡商品经济较为活跃，浙东学派一代宗师黄宗羲早就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人们有较强的商品观念，以商为业，因商致富，代有其人。明清时期，宁

波商人开始在各地崭露头角。进入近代，由于西方列强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中国社会经济近代化的进程举步维艰。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社会经济格局。众多宁波籍企业家，领风气之先，他们审时度势，纷纷前往上海、天津、汉口等通商大埠，从事经济活动，特别是对外贸易活动。他们以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凭借着由家族同乡关系凝结而成的团体力量与群体效应，顽强拼搏，艰苦创业，迅速由旧式商帮转化为新兴经济力量，为振兴近代民族经济，推动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从中不仅孕育了一批饮誉国内外的经济能人，而且形成了在国内工商各界中颇有影响的企业家群体——“宁波帮”。

“宁波帮”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是近代中国工商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早在1916年，孙中山先生就曾对“宁波帮”企业家作过高度的评价：“宁波人对于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人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宁波帮”在近代中国工商界的各个领域均有广泛的影响，在航运业、贸易业、金融业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由此赢得了“无宁不成市”的赞誉。

富有开拓进取意识的近代“宁波帮”，不仅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而且早就飘洋过海，走出国门，谋生创业。他们冒险犯难，披荆斩棘，以自己的勤劳与智慧为所在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成为国际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华人群体。如今活跃在海外的宁波籍企业家继承和发扬了老一辈“宁波帮”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和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竞争和祖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宁波社会经济的发展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认真研究近代“宁波帮”的经济活动，总结其成功经验，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思想认识上的不一致，对以“宁波帮”为代表的近代民族企业家的地位与作用，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与重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应该转变观念，对其给予正确全面的评价。毋庸置疑，以近代“宁波帮”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在推动我国社会经济近代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近代“宁波帮”的成功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

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与近代中国已有根本的不同。但在当时中国内乱外患交迫、充满艰险的社会环境下，近代“宁波帮”企业家那种为振兴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富强而顽强拼搏、呕心沥血的爱国精神，勇于开拓进取、大胆创新、脚踏实地的创业精神以及强烈的市场观念，团结合作的群体意识，都值得我们后人学习和借鉴。近代“宁波帮”创业史是一份有待总结的精神财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造就一支宏大的企业家队伍。往者已已，来者孜孜。愿我们的企业家从近代“宁波帮”的成功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愿我们对近代“宁波帮”的研究更深一步，以利动员更多的“宁波帮”和帮宁波人士，为早日把宁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而努力奋斗！

项秉炎

1995年12月

目 录

序言	项秉炎
1. “宁波帮”浅析	(1)
2. 宁波商帮的起源与发展	(4)
3. 宁波商帮的形成与其特色	(11)
4. “宁波帮”的形成初探	(32)
5. 传统家族同乡关系与“宁波帮”的崛起	(45)
6. 明清时期宁波商人集团的产生和发展	(56)
7. 近代宁波商业和商人	(69)
8. 近代“宁波帮”与上海经济	(75)
9. “宁波帮”与上海工商业	(86)
10. 上海的“宁波帮”	(98)
11. 在天津的“宁波帮”	(112)
12. 近代“宁波帮”文化心态初探	(125)

13. 试论近代宁波籍工商人才群体的形成……… (137)
 14. 宁波商帮的经营之道…………… (149)
 15. 宁波商人与民信局兴衰述论…………… (154)
 16. “宁波帮”和“徽帮”之比较…………… (163)
 17. 从“无宁不成市”说起…………… (178)
 18. 中国商人的典型——“宁波帮”…………… (185)
 19. 近代宁波籍买办势力研究的几个问题…………… (200)
 20. 浅谈宁波籍买办问题…………… (209)
 21. “宁波帮”和上海的金融势力…………… (216)
 22. 清末时期的宁波商人…………… (233)
- 附录：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宁波同乡联谊会)
简介…………… (242)
- 编后记…………… (247)

“宁波帮”浅析

徐季子

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名于世，俗称“无宁不成市”，意思是说凡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都有宁波人在经营工商业。因为宁波在外地从事工商业的人多，而且经营得法，有较扎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宁波人又比较看重乡情乡谊，宁波人帮宁波人，互相帮衬，相互依托，这就大大地增强了宁波工商业者的实力地位。于是外省人将善于经营、又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宁波人联在一起，称之为“宁波帮”。“宁波帮”和“山西帮”、“安徽帮”、“潮州帮”、“福建帮”……一样成为我国工商经济发展史上著名的商帮。19世纪以来，各地的商帮都有起有落，唯有“宁波帮”却历久不衰，而且越到近代“宁波帮”的声誉越隆，尤其在港台等地宁波实业家的经营才能、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是举世闻名的。

宁波人既以善于经商闻名，人们就简单地将宁波人的才干归结为“会做生意”。其实这样来看宁波人的聪明才智是不全面的。宁波实业家的创业和开拓精神来自他们审时度势、观察局势的敏锐，勤于进取、敢冒风险的勇气，克勤克俭、求实务本的干练和见微知著、随机应变的手腕。以上多种素质交融一体，才形成宁波实业家的才智和本领。为此，我们认为宁波人的才能与宁波的历史文化传统有一定关系。

最早在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就显示了他们非常的智慧，在古文化遗址中河姆渡遗址属于先进的序列。远在公元前10世纪宁波就是造船和海运基地。《周逸书》记“成王时，于越献舟”，周成王时越地就有船只输贡。《慎子》记载“行海坐而至越，有舟故也”，意思是说在海上可以坐着行进到宁波，因为有了船的缘故。据张道渊考证，“于越所献之舟”“当造于今宁波市”，他还认为：

“《慎子》所记，为宁波市航海之最古记录……宁波市实为中国造船与航海之发轫地也。”（文载 1933 年《国风》三卷 9 期《宁波市在国际通商史上之地位》）。在唐代，“海外杂国贾舶交至”（宝庆《四明志》），宁波海外贸易相当发达，各国商船都到宁波来贸易。在宋代，《宋史·神宗纪》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曾在明州造二艘巨舰，“一曰灵虚致远妥济，次曰灵飞顺济，皆名为神舟”；此外还造有“万斛船”，在当时可算是世界最大吨位的海船。在元代，庆元年间宁波是重要的海运外贸港和军港。以上记载都说明宁波海上开发是很早的。

北宋在王安石任鄞县县令时，试行局部改革，宁波人就比较注意如何来改善自家的经济和文化生活。南宋时有“心学”大师杨简等人聚集在月湖讲学，他们宣扬的虽是陆象山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但他们要求道德、人格的自我完善，在读书人中起过较好的作用。现在宁波人中间还流行“做人凭良心”的常用语，这不能说“心学”对此没有一点影响。明代，姚江王守仁（阳明）倡“致良知”学说，他说：“知善知恶，是谓良知；为善去恶，是谓格物。”要求人们以反求自身的修养方法来完善自己。同时他还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主张“知行并进”。王阳明思想对讲究实际，善于经营，着重商业信誉的宁波人是有一定影响的。清初有名的思想家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经世致用”的唯物主义观点，更直接影响了近代宁波实业家重视工商业的思想。鸦片战争后，宁波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传统的宁波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带来许多消极因素，但同时也输入了近代科学知识，宁波外出经商的人多了，在国内外一些大商埠中逐步形成了“宁波帮”。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热心办学，培养为商业服务的人才，反映了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要求。宁波实业家捐资在家乡办学是有传统的，这也是近代宁波文化的一个特点。

我们研究“宁波帮”，要以更广泛的范围，更多面的视角，来探索“宁波帮”的历史、现状和发展的趋势，从而在理论上加深

对动员全世界“宁波帮”来建设宁波深远意义的认识。

发动“宁波帮”来建设宁波，从广义说，孙中山先生早在1916年已提出来了。1916年8月孙中山在宁波作了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演讲，他说：“宁波风气之开，在各省之先。将来整顿有方，自可为各省之模范，以地位、人才，均具此项资格。”同时，他在“振兴实业”、“讲求水利”、“整顿市政”三个方面提出了设想。讲到振兴实业时，他说：“宁波地方之实业，非不发达，然其发达多在外埠，鄙见以为发展实业，在内地更为重要。试观外人其商业发展于外者无不先谋发展于母地，盖根本坚固而后枝叶自茂也。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验，本不浅薄，而甬江有此良港，运输便利，不独可将商品运输于外洋，若能悉心研究，力加扩充，则母地实业既日臻发达，而甬人之营业于外者，自无不随母地而益形发展。”孙先生是有远见的，这些话，当时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而在今天却是有现实意义的。

邓小平同志在设计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蓝图时，十分关心沿海地区的发展，专门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这是他高度重视世界各地“宁波帮”的作用，看到宁波具有建设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的条件，才发出这个号召的。现在宁波市人民在党和政府领导下，正在为实践这一号召而努力，在海外的宁波籍人士也十分关心家乡的建设，因此对“宁波帮”作一专门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眼前这方面需要研究的课题很多，例如关于“宁波帮”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向及“宁波帮”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等等问题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深入。对“宁波帮”真正能作出有价值的研究，则有赖于关心于此的海内外学者、专家来共襄其成。

宁波商帮的起源与发展

鲍 杰

宁波商帮以善于经商而闻名于世。所谓宁波商帮系指原宁波府所属的鄞县、奉化、镇海、慈溪、象山（南田）、定海和以后划入的余姚七县旅居外地的宁波商人，在从事商业活动中逐步形成的群体。它是以同乡情谊为纽带，行业为依托，互助互利为目的，具有地域性的同乡社团组织。

—

宁波濒临东海，山海相连，由于耕地不足，自古以来居民多外出经商。明末清初，商品经济逐渐发达，特别是“五口通商”以后，外国资本侵入，引起了城市经济的变化。宁波商帮即以宁波为基地，把活动转向上海，遍及长江流域和天津等商埠。《甬江初集》载：“当沪埠草莱未辟，吾甬人以冒险之天性，斩荆披棘经营所业，其间筚路褴褛，艰苦卓绝……洎乎既为商埠，来者愈众，吾甬人所经营，亦渐次发皇，环顾沪上各业，胥有甬人……”旅居上海的宁波商人和手工业者，基于发展的需要，相继组成了各种行帮小团体。商业行帮有同善会（业）、崇德会（海味业）、永兴会（南货业）、敦仁堂（猪业）、喻义堂（药业）、诚仁堂（肉业）、永济堂（洋货业）；手工业行帮有长寿会（石作业）、年庆会（木业）、同义会（银匠）；劳工团体有四明长生会，水手均安会等等。这类小团体具有同乡和同业的双重结构，它以维护集体利益、互济互助为目的，这是宁波商帮的雏形。清嘉庆二年（1797年），宁波人钱随、费元圭、潘凤占、王忠烈等发起募捐，以行业帮会为基础，筹建“四明公所”，购地建屋寄柩，至嘉庆八年（1803

年)建成。钱、费、潘、王等被推举为最早的公所董事。道光十一年(1831年),又由董事方亨宁、方亨黉、谢绍心、庄锦等发起募捐重修,扩大冢地,增建丙舍,并设赔材会等,这时期公所以办理同乡义冢,推行善举为主。咸丰三年(1853年),公所房屋因战事被毁,得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发起重建,并设济元堂,为同乡集会之所。1870—1892年间甬人的行业与地域性的公所、会馆继有发展,如酒业公所、竹业公所和定海会馆等,这些公所、会馆都是四明公所的团体会员。

清宣统元年(1909年),慈溪旅沪商人洪宝斋创议筹组四明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地域性同乡会组织。次年(1910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宣统三年(1911年)宁波旅沪同乡会在四明公所召开成立大会,首任会长是沈仲礼,副会长是朱葆三和虞洽卿。民国初期(1916—1920年)两次召开征求会员大会,扩大宁波同乡会实力,此后李征伍、虞洽卿等先后被推举为会长,同乡会章程几经修订,扩大了原来的同乡互助互济的目的,明确“以团结同乡团体,发挥自治精神”为宗旨。成为联络甬人旅沪各种团体,举办公益,排解纠纷,普及教育,谋取共同利益为目的的自治社团组织。它标志着宁波商帮已正式形成。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后,致力于普及教育,培养旅沪甬人子弟,至1928年已办有小学10所,学生多达三四千人,并开办了职业介绍所等新式社会事业。1920—1935年间,以县为单位的同乡会如定海、镇海、奉化、象山等县旅沪同乡会亦相继成立。这种地域性的小团体,更便于维护同乡的共同利益和密切家乡关系。

二

上海港开埠以来,以其地处长江流域的终点,腹地深广,交通便捷的优势,逐渐成为全国内外贸易的中心。而宁波则相对衰落,对外贸易额从1844年的55万元,到1849年减少近百分之九十。那时,各省商帮云集上海,宁波商人以甬沪交通便利,轮船

一夜可达，故大批转向上海，与原在沪的甬商相结合，逐渐渗透到上海商业的各个领域。在太平天国时期，宁波殷实富户，多避难入上海租界，后定居在沪从事商业活动。20世纪初期，宁波商人势力大盛，在沪甬商约有5万多人。突出在对外贸易方面，“较早开放的宁波地方商人也来沪经商，他们迅速在买办阶级中产生巨大影响，并在棉纱、棉布、鸦片、五金、钱业中占据重要地位。”^① 上海最早补外商雇佣的买办多数是宁波人，如杨 是英商怡和洋行买办，虞洽卿是德商鲁麟洋行买办，刘鸿生是英商开平煤矿买办，蒉延芳是英商德丰公司买办，周崇良是德商谦和洋行和德孚洋行买办。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上海外资银行林立，宁波商帮中一部份商社买办和具有通晓外语，并有熟悉金融业务和一定资产担保的商人，能任外资银行买办，如华俄银行和荷兰银行买办为虞洽卿，英商大英银行买办为徐懋堂，法商汇理银行买办为朱云祐、朱志尧（云祐弟），法商麦加银行买办为汪清源，华义银行买办为厉树雄，美商友华银行买办为傅筱庵等。金融买办与贸易买办的结合，推进了宁波商帮在沪经济界的实力地位，逐渐压倒了在沪各帮，居上海商界的首位。

宁波商帮在沪占据优势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一批代表人物先后成为上海商人的领袖。清光绪27年（1901年），得到清廷认可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慈溪人严信厚首任总理，1903年改为上海商务总会，严继任会长，在长达40余年（1901—1946年的）上海商会中，宁波商帮中的朱葆三（定海）、周晋镳（慈溪）、虞洽卿（镇海）、秦润卿（慈溪）、宋汉章（余姚）、李厚祐（镇海）、方积蕃（镇海）、傅筱庵（镇海）、袁履登（鄞县）、俞佑庭（鄞县）、厉树雄（镇海）、方椒伯（镇海）、金润庠（镇海）等人历任商会会长（理事长）、副会长（副理事长）、理事、执委等要职。^② 当时的上海商会已成为政府管理商业的自治团体组织，它具有裁决会员间纠纷、管理商界各行业的权力、并接受政府委办事项，在仅在沪经济界拥有相当权力，在政治上也有一定影响。第二，宁

宁波商帮掌握了居上海百业之首的金融领域。1917年上海钱业公会成立，秦润卿为第一任副会长，次年继任会长，其后连任四、五、六届总董，七、八、九届公会主席；1918年上海银行公会成立，首任会长为宋汉章。19世纪中叶，执上海牛耳的9家钱业资本家族集团，宁波商帮占有6个（慈溪严氏、奉化朱氏、鄞县秦氏、镇海李氏、叶氏、方氏），他们的实力，一是初期依靠山西商帮的长期贷款经营钱庄，同时宁波钱庄发行“庄票”（期票）代替现金流通；二是上海外国银行接受宁波钱庄的“庄票”，而宁波钱庄接受外国银行发放的名为“拆票”的短期流通资金；三是吸收每年由宁波汇沪达2—3千万元的汇款。第三，宁波商帮在沪经营工商企业迅速发展。据1941年统计：总共有2230家，其中：商业企业1704家，分布在沪商业的98个行业，而在海运、制糖、粮油、药材、人参、颜料、西药、棉纱、五金机械、银楼、煤炭、海味、钟表等行业中独占优势。第四，在上海的贸易、金融买办中具有较大影响，也是宁波商帮得到壮大发展的重要契机。

三

上海早期的贸易（金融）和买办所拥有的财力，是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宁波商帮中的朱葆三投资兴办了中法航运公司、华商人寿保险公司、华兴水火保险公司、中兴面粉厂、吉邦橡胶公司、中日合营绢丝公司，还在汉口、广州办自来水厂等；叶澄衷以在沪开设五金杂货店起家，先后开设钱庄，经营房地产，并在汉口投资办造纸厂、火柴厂等；最具代表性的是刘鸿生，任英商开平煤矿买办后，先后投资创办了火柴厂、水泥厂、毛纺厂、煤矿以及银行、保险等工商企业，集轻工、重工、商业、运输与金融业于一身，成为具有全国性的刘氏企业集团；虞洽卿创办三北轮船公司、宁绍轮船公司等，投资共达450万元，至1935年已拥有大小轮船65艘，载重量共达9万吨，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13%，成为全国民办商轮的巨子。刘、虞两氏，